

比较

2018年
第5辑
总第98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阿德里安·伍德

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方案的今昔对比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

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方案

王小鲁

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奥利弗·威廉姆森

新制度经济学盘点与前瞻

保罗·科利尔

经济失败的文化根源

阿比吉特·班纳吉 等

从概念证明到政策推广

吴敬琏

平台经济与公共政策

黄 勇

对互联网平台竞争的一些思考

吴汉洪 刘雅甜

平台经济与反垄断政策

周诚君

本币驱动的金融开放及其政策含义

姚 前

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田 静

集团内金融机构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比较

总第98辑

2018年第5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 98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86-9544-0

I. ①比… II. ①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6121 号

比较·第九十八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9544-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马媛媛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张翔

执行副总经理 张立晖

副总经理 傅继红

发行总监 周广宇

品牌传播部高级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6 号楼5层（邮编：100027）

卷首语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比较》今年重新刊发了当时有关改革开放的文献和一些纪念文章,这一辑选取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启时的记忆,以回顾那一段全民上下激情澎湃、思想开放和处处生机勃勃的峥嵘岁月。

1984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功推广,改革不仅成为共识,而且深入人心,并得以从农村进一步扩展到城市,此时,怎么改革,以什么方案改革,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应中国领导人的邀请,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考察,并在1985年提交了一份主报告、6个附录和9篇背景论文。这些考察报告,尤其是主报告影响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方式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从经济研究来说,考察团在中方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为中国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的范本。

在世行首任驻华代表,也是中国经济考察项目的总负责人林重庚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特意邀请上述主报告的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阿德里安·伍德教授,为《比较》专门撰写一篇回顾文章《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今昔对比》。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1985年世行主报告撰写的原因和经过,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错漏之处。随后,借助与1985年报告的“提要”相同的分析架构——增长格局、经济管理和政策,讨论了中国当前面临的某些长期发展问题,尤其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强化企业间竞争、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为了让读者回到当时的情景,我们节选了1985年世行主报告的“提要 and 重点”部分,重新刊登。该部分内容首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预测,对高速增长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同时就经济增长格局、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和重要建议。在增长格局上,指出应重视教育、农业、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应重视城市化问题,并建议中国在继续保持以工农业产出增长为重点的增长格局的同时,也应当考虑更多地强调发展服务业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在体制改革问题上,探讨了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建议和完善会计和法律制度,价格改革等重大问题;强调企业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必须有经济上合理的价格,还必须要竞争。在社会政策方面,报告探讨了社会保障、住房和社会服务、人口问题、农村贫困等,并提出了建立社会

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建议。可以说，这份提要勾画了中国改革任务和政策的主要轮廓，今天重读，世行专家的洞察力和远见仍令人感叹。

改革开放40年，成就显赫，但中国目前还只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从体制到发展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正面临某些严重的挑战，甚至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和争议。王小鲁的文章依据他在改革期间的切身经历和研究，分阶段回顾了过去40年的改革进程，分析每一阶段改革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尝试回答如下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改革之路？是什么导致了过去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又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未来改革将向何处去？

2009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文章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回顾和展望。他首先将社会分析分成四个层次——社会嵌入层、制度环境层、治理以及资源配置和就业，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这四个层次中的位置。随后，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好想法，如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制度或组织的可行性和可修复性，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和官僚体系，好想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好想法的形式化和实证研究。这些好的想法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当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国家发展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时，可以加深对经济的了解，并使相关政策建议以更稳健、更审慎的方式推进。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上，威廉姆森持开放的态度，认为在形成统一的理论之前，应当接受多元理论。他还乐观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虽如星火’，但可以得到燎原般的发展”。

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长期致力于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关注这些国家最底层人群的命运。在这篇题为“经济失败的文化根源”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严谨、统一地研究功能失调的“文化”概念，并阐释功能失调的文化如何导致与繁荣相悖的结果，即让人们陷入各种苦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文化由称为信念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网络组成。身份、叙事和规范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三种主要信念，它们相互依存，且与社会网络相互作用，使功能失调的文化及其带来的后果可以存续，继而影响三种信念和人们的行为选择，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科利尔还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分析功能失调的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三个领域——社会、家庭和组织机构，展示了这一框架能够分析传统经济学最不擅长的行为范畴，得出一些共同的分析属性和经验规律，从而“有可能使社会科学更趋完整，而无需诉诸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近年来，随机对照实验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该方法可以通过评估某一特定项目，收集相关证据，帮助研究者进行微调和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复制，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是随机对照实验的领军人物，他和合作者的文章正是探讨随机对照实验对政策推广的作用。

他们首先归纳了将局部随机对照实验的结论应用于大规模政策推广面临的六大主要挑战：市场均衡效应、溢出效应、政治反应、情境依赖、随机化或选址偏差，以及试点偏差。随后，作者们以印度非政府组织伯乐林教育基金会的“按实际水平施教”为例，说明如何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应对上述六大挑战，使循序渐进的实验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工具，为政策变革提供动力。

周诚君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的金融开放。中国下一步金融开放的重点将放在金融账户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及相应的资金跨境流动管理上，重要的是，这一开放进程恰逢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和下一步重点，在此基础上，厘清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过程中本币和外币发挥作用的区别，推进本币驱动的金融开放，并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外汇市场模式选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

数字货币是当前金融领域最引人关注的新兴事物之一。姚前的文章以现代密码学演进为参照，追溯了数字货币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剖析了数字货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特征与功能。他认为，数字货币应是电子货币与实物现金的综合体。缺乏价值支撑的虚拟货币须“去虚拟化”，加上强有力的央行信用，否则难担大任。在数字货币研发进程中，公权与私权，既对立又统一。面对私人部门创新，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奋起直追。文章还详细回顾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历程、技术脉络与发展思路，并从基于账户或基于价值、自顶向下或自底向上、量子货币三个维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形态和技术架构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且越来越多地走向产融结合，为金融监管提出了新挑战。针对企业发展的这一趋势，田静提出了金融监管中“系统重要性集团”的概念。她认为，这类集团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种要素、资源会加剧向这类集团聚集，不仅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也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旦这些集团发生危机，就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政府不得不救助，这又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软预算约束和大而不倒的问题可能蔓延到更广的范围。由于系统重要性集团的特殊性，当务之急要明确对产融集团的政策导向，再据此制定全方位的监管制度，综合实施改革方案，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配合，系统完善集团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近来，相关互联网平台企业陆续发生了一些公共事件，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策争议，为此，“平台经济”栏目为读者提供了四篇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文章。主编吴敬琏的文章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引发的对垄断的担忧和信息保护等问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捍卫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采用正确的方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他同时强调，人类正处在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关于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面临的不同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深入和全面

的讨论。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检索梳理文献,在学的基础上,从基本问题出发,运用基本理论,开展深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才能找到解答。

平台企业花样翻新的竞争行为常常引发一系列问题和争议,并给公共政策制定、监管和执法带来挑战,对此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认为,既不能简单照搬法律条文,更不能出台临时抱佛脚式的行政措施,而是需要从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定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创新和监管的权衡以及国际化视角,灵活审慎地适用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考虑如何营造更加公平、开放,更加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吴汉洪等人的文章,分析了平台经济的五大特征:双边用户的需求互补性、网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用户的多归属性以及从渠道模式到平台模式。作者以谷歌的比价购物服务反垄断案、滴滴优步并购案和优步反垄断案为例,分析了这五大特征对现行反垄断政策带来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执行反垄断等公共政策,他们建议应加强对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以了解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要关注技术的发展,还要鼓励跨领域、跨学科和国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戴维·埃文斯的文章梳理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几十年来的兴衰史,试图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便利,并使企业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快速实现全球规模,且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挑战现有平台领导者,迫使它们不管看上去多么不可战胜,都必须持续不断地保持创新并为用户创造价值。但埃文斯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竞争当局就可以置之不理。像所有企业一样,互联网平台也可能从事非法串谋或垄断,压制竞争。不过,竞争当局的执法行动应当基于证据的分析之上,关注平台的行为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还要充分了解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历史及其蕴含的经济学逻辑。

目 录

Contents

第九十八辑

- 1 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今昔对比 阿德里安·伍德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Past and Present
by Adrian Wood
- 31 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提要 and 重点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Summary and
Conclusion *By Economic Study Team of The World Bank in 1984*
- 66 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王小鲁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by Xiaolu Wang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106 新制度经济学：盘点与前瞻

奥利弗·威廉姆森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by Oliver E. Williamson

前沿

Guide

132 经济失败的文化根源：一种概念工具

保罗·科利尔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Failure : A Conceptual Toolkit

by Paul Collier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170 从概念证明到政策推广：应用中的挑战和应对之策

阿比吉特·班纳吉 毓文妮·班纳吉 詹姆斯·巴里

埃丝特·迪弗洛 哈里尼·卡纳安 肖巴哈尼·慕克吉

马克·肖特兰德 迈克尔·沃尔顿

From Proof of Concept to Scalable Policies :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with an Application

by Abhijit Banerjee, Rukmini Banerji, James Berry, Esther Duflo,

Harini Kannan, Shobhini Mukerji, Marc Shotland, Michael Walton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204 本币驱动的金融开放及其政策含义

周诚君

Further Opening-up Driven by Facilitating RMB'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by Chengjun Zhou

- 213 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姚 前
 Digital Currency : Origi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By Qian Yao*
- 228 集团内金融机构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田 静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in Conglomerates : Their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The Responses *By Jing Tian*

平台经济

Platform Economy

- 246 平台经济与公共政策 吴敬琏
 Platform Economy and Public Policies *by Jinglian Wu*
- 251 对互联网平台竞争的一些思考 黄 勇
 Some Thoughts on Competitions of Internet Platform *by Yong Huang*
- 256 平台经济与反垄断政策 吴汉洪 刘雅甜
 Platform Economy and Antitrust Policies
by Hanhong Wu and Yatian Liu
- 269 在线平台的动态竞争 戴维·埃文斯
 Why the Dynamics of Competition for Online Platforms Leads to
 Sleepless Nights, but not Sleepy Monopolies *by David S. Evans*

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

今昔对比

阿德里安·伍德

编者按：今天我们发表前世行高级经济学家、现牛津大学荣休教授伍德回顾世行经济考察团 1985 年关于中国经济报告的文章，并重发该报告的摘要和重点部分，来唤起改革历史的记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改革开放启动时，“文革”梦魇刚刚结束。《比较》主编吴敬琏教授曾经写过，由于十年“文革”，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使上亿人遭到迫害（叶剑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发言），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救亡图存的共识。这正像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文革”的沉痛教训可以说是 40 年前改革开放取得高度共识的首要背景。

中央领导层密集地出国考察则促成向世界学习的广泛共识。1978 年 7 月 6 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传达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要求：不但部

* Adrian Wood, 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发展专业荣休教授。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世界银行或 1985 年报告的其他作者的看法。作者向林重庚（Edwin R. Lim）、林至人（Cyril Lin）和基恩·蒂德里克（Gene Tidrick）致谢，与他们在多年中就本文所涉议题展开的讨论使我获益良多，本文的初稿也得益于他们的评论和建议。

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出国，扩大影响，开眼界。从而在1978年形成出国考察潮。当年即有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各考察团都从看世界中受到了思想冲击，一方面看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进步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可以广泛学习借鉴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经济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启动的这一发端，也成为贯彻改革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文革”中期开始陆续被“解放”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发挥了中坚作用。他们往往充满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感，要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在旧的结构原封未动、新的结构尚未形成时，这些充满大胆探索精神、思想开放的领导人响应人民的呼声，灵活有效地解决了大量实际经济问题，释放了经济的活力。这批干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因而被傅高义教授称为“党政创业者”，认为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改革的重要方面。

在解决了要不要改革的共识以后，怎么改革、以什么方案改革，或改革战略、改革道路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前后，中国高层与中国经济学界，广泛致力于如何摆脱陈旧的理论束缚，探索改革开放的具体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个关键时间，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的报告（包括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和6个附录、9篇背景论文）应运而生，并影响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方式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从经济研究来说，考察团在中方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为中国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的范本。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银行的这一系列报告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带有界碑性质。

从政策制定层面来说，主编吴敬琏指出过：“高层领导人不但亲自认真阅读了该报告，还要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对其深入研究。”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采用了世界银行的重要建议。领导同志还要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根据世行报告重新起草“七五”计划。另外，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的报告经中国政府同意，还以中英文公开出版，这就大大超出了政府机构使用的范围，普通民众也可以购买和阅读。

世界银行组织 1984 年经济考察团，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1983 年与世界银行行长议定。考察研究团队由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领导，50 多位世界银行各领域专家和咨询师，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其中 9 位参与主报告撰写，伍德教授是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之一，独立撰写前两章并参与其他各章节。同时，伍德教授也是“提要”主笔人。考察团于 1984 年对中国历时 9 周的访问，1985 年再访中国，主要讨论报告草案。对中国的调查和访问得到了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支持和帮助。卓有成效的专业团队和中方密切合作，使这项研究得以高质量完成。

今天重读这份报告，仍然感叹世行专家的洞察力和远见。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预测，对高速增长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同时就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给出了重要建议。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报告提出应重视教育、农业、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改革问题上，报告探讨了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建议和完善会计和法律制度，价格改革等重大问题。在社会政策方面，报告探讨了社会保障、住房和社会服务、人口问题、农村贫困等。可以说这份报告勾画了中国改革任务和政策的主要轮廓。报告中对改革与发展带有普遍性的建议，契合 20 世纪 90 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因而融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改革记忆”因此而生。

1985 年，当中国处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早期阶段时，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的《提要》部分在本辑《比较》重发。本文由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撰写，希望结合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来探讨该报告的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是回顾，简要介绍 1985 年世界银行经济报告撰写的原因和经过、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错漏之处。第二部分是展望，借助与 1985 年报告《提要》中相同的分析架构——增长格局、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的某些长期发展问题，尤其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强化企业间竞争、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1. 对世界银行 1985 年报告的回顾

对于 1985 年报告的《提要》，读者可以也应该有各自的看法。这里将增加某些背景信息，并指出其中与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尤其相关的几个方面，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

1.1 动机、内容和作者

正如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在该报告的《前言》中所述：“本项研究的想法始于我于 1983 年对中国的访问。在北京，我得到同邓小平主席和赵紫阳总理会谈的机会……我们谈到中国要在 2000 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 800 美元的国家目标……通过在北京的讨论达成了一份协议，世界银行将针对中国在此后二十年可能面临的某些重大发展议题开展一项研究，尤其是结合国际经验，分析应对此类议题的某些政策选项。”

1985 年报告是世界银行在 1981 年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的自然延续。^①那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的报告结合国际比较，总结了中国在 1948—1978 年的多项成就，包括减贫、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等，也指出了过去的缺陷，并探讨了当时面临的问题。1985 年报告同样强调指出：“在克服现行体制缺陷的同时，也迫切需要防止其丧失调动资源和扶助贫困人口的力量。”

1985 年报告对广泛的发展议题提供了前瞻性分析，包含丰富的内容：由 10 个章节组成的主报告，以及 6 个附录和 9 篇背景论文。^②作为主报告构成部分的《提要》极为简要地介绍了覆盖的议题领域：农业、能源、运输、工业、外贸、城市化和教育等。《提要》部分的重点不同于主报告把大部分具体部门的议题集中在“增长格局”一节中，而是用更多篇幅讨论体制改革和社会议题。

① 这第一份报告后来（1983 年）以中英文出版。英文版可参见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92681468215689422/pdf/multi0page.pdf>。

② 主报告及附录的中文版可以从中国的图书馆获得。主报告英文版可查阅：<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93081468746712782/pdf/multi-page.pdf>，附录可查阅：<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docsearch/report/5206>，背景论文的目录可查阅在线主报告的第 6 页，各篇论文可以分别在线查阅世界银行职员的工作论文。

该报告历时两年完成，有 50 多位世界银行的职员和顾问参与，^① 其中 9 位参与主报告撰写，我是报告的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独立撰写前两章并参与其他各章节。我也是《提要》主笔人，总负责人林重庚（Edwin Lim）先生在里面提了不少重要意见，特别是关于经济管理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基于我们共同撰写的第十章）。

我们的工作包括：1984 年对中国历时 9 周的访问，涉及甘肃、湖北、江苏和北京；1985 年再访中国，主要是讨论报告草案。正如报告《序言》所述，在这些访问中，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中方的朋友与同事的信息、评论和建议，极大地提升了该报告的质量。

1.2 1985 年报告的主要建议

最终报告以中英文版出版，既在政府机构的官员之间传阅也让普遍民众购买。^② 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可能引起了当时中国读者的关注。

（1）具体部门的议题。此类议题包含：食品摄入中畜产品比例的提高，高等教育的过分专业化，能源节约的优先事项，对公路运输战略的需要，经济活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最优配置等。该报告对此类重要议题提供了大量基于国际经验的建议。为增强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我们将许多内容结合了多部门模型的预测。当时有规模更大的中方团队用多部门模型测算 2000 年的国家发展前景（Wang and Li, 2018, 第 ix—x 页）。与他们的相互交流令我们受益良多。

（2）早期和中期的体制改革议题。此类议题主要涉及价格改革的方向和速度的选择、物资配置和劳动力配置、投资决策，以及外贸管理等。依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努力，这些议题后来都通过在如今的中国经济体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加以解决了，但在当时还颇受争议。

在上述大多数议题上，我们主张采取持续但渐进的自由化做法。但我们对于价格双轨制颇为担忧，认为这“或许只能是价格和物资配置体制改革中的一个过渡办法”（World Bank, 1985, 第 177 页）。在那个时点完全放开价格也

① 名单见报告《序言》和主报告的扉页。主报告的 9 位作者是：Edwin Lim（项目主管）、Adrian Wood（项目副主管）、Ian Porter、William Byrd、Timothy King、Gerhard Pohl、Robert Taylor、Gene Tidrick 和 Wouter Tims。

② 吴敬琏指出（Wu and Ma, 2016, 第 144—115 页）：“高层领导人不但亲自认真阅读了该报告，还要求经济主管部门的官员对其深入研究。”

许是错误的（Weber，2018），然而我们很担心双轨制造成的不公平，包括腐败的诱惑等。^①

（3）三大产业部门的平衡。该报告认为，体制改革会要求和促使中国经济中三大部门的结构以非常不同于政府预期的方式发生变化。

在我们撰写该报告时，官方制定的目标是使工农业总产值在 1980—2000 年翻两番。正如《提要》中“部门之间的平衡”那小节所述，这种对物质生产扩张的强调固化了中国（以及苏联）在传统上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中国没有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率需要开展市场监管、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深专业化分工，而这些都要求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支持类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中国也没有认识到，居民家庭对市场需求的影響力增强将刺激个人服务业供给的大幅扩张。

因此，我们报告中的长期预测既分析了官方“翻两番”目标的影响，也分析并建议了另外一种更平衡、更强调服务业（包括基础设施）的发展道路。其差异见表 1 中反映的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在“平衡增长”一节对 2000 年的预测中，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低于“翻两番”的预测，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要高得多。平衡增长预测能够取得与翻两番预测相同的 GDP 增长率，但所需的投资更少，用于消费的部分更多。

表 1 中国的就业结构和预测（%）

	1981 年实际值	2000 年预测值		2000 年实际值	2014 年实际值
		翻两番	平衡增长		
初级产业	71.1	60.0	53.2	50.9	33.6
制造业	14.0	18.8	15.4	14.5	18.2
服务业	15.0	21.2	31.4	34.6	48.2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1981 年实际值和 2000 年预测值来自 Word Bank（1985，附录 4）；2000 年实际值和 2014 年实际值来自 Wood（2017）。

注：初级产业包含农业和矿业，矿业在 1985 年世行报告的表 4 中被列入重工业；服务业包含除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产业。

① 直到 1993 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价格全面放开才成为中国的政策。我曾通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鼓励加速价格改革，其中介绍了越南成功实现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放开，同时降低了总体通货膨胀率的经验（Wood，1990）。